

學生福音運動在中國

朱子閑

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中國的學生事工幾乎與近代更正教在華宣教史一樣長久。馬禮遜 1818 年就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為要教育及影響華人青年及兒童，這是華人的第一所洋學堂。而此後的來華西方差會多重視以教育拓展宣教的空間，擴大教會的影響。到 1950 年，西方差會全面撤離中國前夕，在中國仍然擁有高等學校 20 所，中學 300 多所，小學 6000 多所。¹ 由此可見，教育對於宣教的影響。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真正對大學校園產生宣教性影響的“學生事工”可以說是以基督教青年會（YMCA）對華宣教開始的。1895 年來會理（David W. Lyon，1870—1949）在天津聯合多個大學的學生創辦了中國的第一個青年會組織。翌年，北美協會總幹事穆德（John R. Mott）來華。訪問了多所大學，佈道與演講，直接催生了 22 個學校青年會成立，促成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於同年在上海召開。² 在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SVM）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北美宣教士來到中國，從此開啓了西方教會向中國知識分子的宣教浪潮。

但是，1919 年中國爆發了以“愛國主義”為底色的五四運動，逐漸演變為一種全社會的民族主義覺醒，矛頭指向一切與“西方”有關的勢力，包括基督教在華的一切組織都被視為是西方列強的一部分。而 1922 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更是一場以愛國的名義排擠於打擊基督教的運動。如何回應日益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引發的仇視基督教的運動，成為西方差會難以迴避的問題。而與此同時，北美的教會正在經歷自由神學與基要主義的論戰直至決裂。青年會深受自由神學

¹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195。

² 馬泰士，《穆德傳》，張仕章譯，青年協會書局，1935 年，102。

的影響，这就导致其所主导的宣教运动从强调个人的得救转向社会整体的救赎。這種轉變也正暗合了当时中國大时代的背景：基督教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西方列強侵略工具，而是“救中國”的僕人。而馬克思與共产主义思潮正弥漫於大学校园与青年人中间，因此，基督教青年會就在中國社會的政治運動、民族主義運動、自由神學的各种因素渗透下掙扎求存，但也逐漸偏離航向。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矛头从西方转向日本，但是隨着大半國土淪喪，諸多國立大學遷往內地，以東部基督教大學為基地的基督教青年會在外患面前深受打擊，其影響力也被極大削弱。

而在此時，上帝在后方興起了以內地會為代表的基要派教會的復興，同時帶動了基要派的學生福音運動的復興。由于战争所带来的混乱使得西方差会原有的体制遭受重创，以及國民政府继续西方支援，也放寬對大學校園的控制，都为学生福音运动提供了寬鬆的環境。而基要派的屬靈復興為這一場學生福音運動注入了內在的動力。

內地會的孔保羅（Paul Contento）牧師夫妇早在 1938 年就在昆明以英語培訓班的方式接觸并服事学生，并吸引多达两百多的学生参加。在此基础上，孔牧師就組建了“亚洲第一个”校园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³此後，趙君影牧師和于力功牧師先後前往廣西、貴州、昆明等地佈道，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大後方的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此後，當趙君影牧師前往重慶的大學校園佈道的時候，學生反響熱烈，在中央大學的禮堂，每晚前來聽道的學生摩肩接踵，信主的學生也與日俱增。再此氛圍中，趙牧師以中國佈道十字軍（China Native Evangelistic Crusade）為主體，與賈玉銘牧師的南山聖經靈修院合作，

³ 李金強、劉義章主編，《烈火中的洗禮——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教會 1937-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383。

於 1945 年夏天，在重慶南山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各大學基督徒聯合夏令營，在此會中，成立“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趙君影牧師任總幹事。在內地會（大衛·艾得理(David Howard Adeney)牧師）的幫助下，學聯以校園佈道、學生培靈會、退休會為主要事工模式，推動了戰時最大的學生福音運動的復興。與青年會的事工理念不同，學聯更注重個人的重生得救見證與悔改的經歷，火熱的傳福音，聖靈的工作，強調聖經的權威。

此後，學聯會的事工快速的成長，很快在全國各個大學校園建立了學生團契。1947 年，學聯在南京舉辦了第二屆全國各大學基督徒聯合夏令營，超過三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參加。在這次營會的影響下，一大批大學生決志獻身，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其中包括了來自東吳大學的查逸錕（大衛），他在 1949 年後前往臺灣，成為臺灣校園福音團契的創始人。同年，一個以保守派信仰為基礎的學生福音運動——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FES）在波士頓成立，趙君影牧師代表學聯參加，中國學聯是 10 個創始會員國里事工規模最大福音機構。到 1949 年，學聯在全國除東北和臺灣之外的 89 間大學建立的學生團契，學生人數超過兩萬人。

但是，隨着國內時局的轉變，學聯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逐漸難以為繼，趙君影牧師於 1948 年離開中國大陸，雖然有宣教士的幫助，但是學聯的事工已經難以擴展。1955 年隨着王明道被捕，北京基督徒會堂被關閉，北京學聯停止，標誌着學聯會在中國大陸的正式終結。但是，這一波基要派的學生福音運動卻沒有停止。學聯所結的果子繼續在海外生根發芽成長。查大衛創辦了臺灣校園團契，艾得理奔波於東南亞，促成了東南亞各國學生福音機構的成立，趙君影和于力功去了北美，繼續服侍北美的華人留學生。

在中國大陸，持自由神學立場的青年會的領袖們如吳耀宗、趙紫宸等在 1950 年後相繼加入三自，代表着他們在神學上和政治上與共產主義的融合與認同。而基要派（如王明道）因拒絕妥協相繼入獄。

中國學生福音運動的再度復甦是在 1980 年以後，有三股重要的力量促成了這一復甦，其中包括北美差派的諸多大學英語老師在中國大學校園中以外教的身份傳福音、學員傳道會差派了大量的美國和韓國的宣教士進入中國、中國城市中的基要派家庭教會對校園的事工。到 2000 年前後，中國大學校園的學生福音運動呈現全國範圍內的復興，一直持續到 2010 年前後，這是中國大學校園福音運動的黃金十年。有多種因素導致這一現象，除了前述西方宣教士再次進入中國大學校園以外，中國政府為要尋求獲得西方（尤其是美國）國家的支持，發展經濟，在社會層面的管控放鬆，默認人民選擇自己的信仰。再就是過去數十年的政治運動剷除了傳統文化及民間信仰對人心的宰制，導致人民在精神上的真空狀態。加之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的靈魂更感孤獨，於是基督信仰在這個時代的背景下填補了人們心靈的空虛，也逐漸成爲一種時尚。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1980 年代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羣體對西方文明的興趣，以及 1989 年的政治運動之後，許多知識分子的家國理想破滅，也促使他們歸信基督。

當代中國學生福音運動的復興對中國教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大量校園畢業生流入城市，尤其是東部的城市，帶動了城市教會的復興。其次是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廣泛關注，比如關心社會邊緣羣體、社會公義、文字出版事工、基督教教育等領域。第三是推動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教會差派了許多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前往中亞、東南亞等地區宣教，這些宣教士因爲受過高等教育，又具有專業技能，所以相對容易掌握當地語言，融入當地的文化處境，

跟國際機構合作。在可見的未來，大學畢業生及職場青年仍然將會是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運動的主力軍。

儘管如此，相對於中國的人口基數以及大學校園的規模，上述的復興仍然只能算是星星之火。根據中國教育部的官方數據，到 2018 年中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 2663 所，普通本專科在校生 2831.03 萬人。⁴而就筆者所瞭解的情況，目前中國各類校園福音事工的基督徒人數佔學生總數的比例不會超過 0.5%。如果與北美大復興時期的學生運動相比就是天壤之別。即使是與一百年前的中國大學校園相比也是一個不樂觀的數據。加之 2018 年《宗教事務條例修訂版》實施以來，中國的大學校園福音事工持續遭遇強烈的逼迫與巨大的壓力，生存越發艱難，事工也陷入困境。因此，無論叢里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中國的學生福音運動道阻且長。但是，筆者相信掌管歷史的主也必掌管中國的大學校園，他曾經如何工作，相信未來也會如何工作。

作者簡介：

朱子閑，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傳道人。於大學期間接受福音信主，畢業時蒙神呼召立志服侍校園，此後十餘年獻身於校園事工。婚後與妻子一起遷往中國西南，服侍少數民族學生羣體。目前在美國達拉斯神學院進修。

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1909/t20190929_401639.html

參考文獻

李金強、劉義章主編，《烈火中的洗禮——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教會 1937-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

馬泰士，《穆德傳》，張仕章譯，青年協會書局，1935。

汪靈光編，《中國與福音學刊（第六卷第一期）：學生福音運動在中國》，臺北：中福，2008。

于力工，《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台北：橄欖，1998。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CA：中華歸主協會，1981。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福出版。1997。

趙曉陽，〈美國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與中華基督教學生立志傳道團〉，宗教学研究。2008，(03)。